

天津市大邱庄农民观念变革情况调查

刘 李 胜

编者按：这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文章。它生动地展现出了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前景和农民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从生产-生活方式到观念的全面更新。文章写得很简练。将此文与下面关于皖北农村和苏南的两篇文章对照起来读，则会有启发。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共有832户，3320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邱庄成立了农工商联合公司，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成为闻名全国的集体富裕乡村。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头脑中那些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陈旧观念开始得到清理，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开始确立，主要发生了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由“为富必资，越穷越革命”的观念转变为“劳动致富，富了光荣”的观念。“为富不仁”，“无商不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解放以后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时期，这种传统观念又和“左”的思想影响结合在一起，以它特有的形式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习惯于把“富”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富就是资本主义，穷才是社会主义。农民只有依附于土地老老实实种田才是“良民”，只有“穷”政治上才能保险。于是人们头脑中逐渐形成了“肩扛锄头、手拿镰刀、蓬头垢面、衣着破旧”的固定的农民形象和生活观念。现在人们则普遍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就是要人们共同富裕起来，社会主义的劳动致富同旧社会的剥削致富有着本质区别，穷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从而激发了劳动致富的巨大热情和强烈的荣誉感。人们把收入多少和富裕程度作为衡量个人劳动贡献大小、政治上进步和落后的重要标志，在观念上再不把穷和革命、光荣联在一起，而把穷和懒惰、无能放在一起。公司各单位每年评出的先进个人，在政治上是具有高度荣誉的人，在经济上则是收入最多的人。例如，1983年，一个普通劳动力和五位厂长个人收入都在一万元以上，他们就成为大邱庄人心目中的有功之臣，受到群众的尊重和敬佩，被树立为学习的榜样。相反，那些劳动收入低的人则被视为“落后人”，受到社会舆论和家庭的压力。随着人们劳动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人们在保持艰苦奋斗的前提下，“吃讲营养，穿讲漂亮，住讲宽敞，用讲高档”的消费观念开始萌发起来。这不能被简单地说是“高消费”，而是在生产发展基础上生活得到改善的必然表现。

二、由“土里刨食”、单一经营的自然经济观念转变为“农工联体”、多种经营的商品经济观念。解放前，大邱庄人祖祖辈辈都是靠自然经济为生。解放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又搞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大批促大干”，把农村的工、商、副业统统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全村1200人只限于单一的种粮经营，其结果一方面造成了粮食总产量只在120万公斤左右徘徊，另一方面又巩固了群众的“玩龙玩虎不如玩土”的自然经济观念。其表现：一是自给性，即农民生产粮食的目的是上缴或自用，没有进行交换的想法；二是封闭性，即社员在观念上只把自己狭小的生产单位作为本位，不重视横向经济联系、市场信息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些观念得到逐步转变。他们在思想上把农、工、商业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办起农工商联合公司，实行农工综合经营，互促互补，使农村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正确轨道。全村先后办起5个总厂，下设34个工业企业，1986年产值实现9743万元，占全

村工农业总产值的80%。每年从工业利润中拿出30至50万元用于扶持农业，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他们生产出百余种商品，畅销全国各地；派出200多名供销业务员，在许多省市设立了办事处，与全国25个省市1680多个单位建立了横向联系和协作关系。这种联系，既包括与企业单位的联系，也包括与科研、教育单位的联系，既包括与城市企业的联系，也包括与乡镇企业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市场和商品信息组织和网点。这时，“农业”在大邱庄人的观念里已不再是单纯种粮的狭隘概念，而是农工商一体化的“大农业”；商品经济，也不再是过去那种开小铺、摆小摊、做小买卖的狭隘理解，而是升级为有现代化设备、技术、管理水平的包括生产各个环节的商品经济；市场，也不再是仅仅局限于天津一个城市的概念，而是扩大为全国甚至国外某些地区的获取原料和销售产品的世界性市场的概念。

三、由怕冒风险、因循守旧的保守心理转变为对外对内全面竞争的观念。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邱庄人开始抛弃了“中庸之道”、“不敢为天下先”、“出头椽子先烂”等封建传统思想和保守观念，认识到竞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树立起对外对内全面竞争的观念。所谓对外竞争观念，即大邱庄人在观念上把中国这个拥有10亿人口的大市场作为自己的竞争对象，坚信商品经济无论多么发展，社会大市场总有某些短缺的商品来供自己创造和生产。他们提出的竞争方针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优，人优我新，人新我早”。所谓对内竞争观念，即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内部各个企业之间、每个职工之间在观念上都把对方作为自己的竞争对象，比经济效益、比产品质量、比服务态度、比贡献大小。公司下属的13个单位虽然业务性质不同，产品种类不同，各单位领导之间有的是父子关系，有的是兄弟关系，有的是亲戚关系，但在追求经济效益和政治荣誉方面，都自然地结成了竞争对手。尤其是5个工业总厂，有的生产同类产品，有的生产不同产品，但几年来都一直憋着一股劲争高低，结果共上新项目33个，1986年创产值4103万元，每个总厂产值都超过1000万元，都比1985年增长40%以上。1986年青农刘风洋公开向著名种田能手、曾获得法国农业骑士勋章的马德良提出挑战，马德良也积极应战，两人分别带领自己的农业作业组，在广阔的田野上展开激烈的竞争，结果粮食产量都超过了60万公斤，平均每人产粮6万公斤，最后使大邱庄涌现出34个马德良式的模范人物。

四、由轻视知识、轻视人才观念转变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观念。过去的大邱庄人普遍地存在着靠传统经验过日子，小农意识，不重视知识，不尊重人才，文化素质比较低，结果出现了“按了电磨倒着转”，“算帐少收1万元”等笑话。三中全会以来，他们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实践中认识到，“知识就是金钱”，“人才就是财神”。只有起用当地的“土财神”，聘请外地的“大财神”，培养下一代的“小财神”，才能振兴大邱庄。他们改变了对人才看法，认为对人要“尊其所长，容其所短，扬其所长，避其所短”。针对不同人的特长，安排不同的工作，发挥其不同的作用。“鬼头鬼脑的搞技术，白白话话(方言，即能说会道)的跑业务，老实巴脚的干体力”，结果使原来有这样那样毛病的人都成了业务骨干和生产能手。大邱庄党支部书记兼总公司经理禹作敏深有体会地说，“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人，有本事的是罪人；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看人，带头致富的是敌人；用派性观点看人，逆我者是仇人；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观点看人，到处是能人”。他们还提出了“给当代人创财富，给后代人留才能”的口号，舍得花本钱进行智力投资和开发人才，提高大邱庄人的文化素质。一是投资办学。他们先后投资30多万元建起了幼儿园；投资150万元建起了一所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的中、小学教学楼；投资80万元联办一所大学；1987年还将投资40万

元，选送3名木村大学生去英国深造。二是鼓励青年自学。公司党委决定，没有初中毕业文凭的人不安排就业，文化水平不同，工资待遇也不同；各厂还作出鼓励职工自学的规定，职工自学取得结业证的一般学习费用由厂里开支，拿不下结业证的自己负担。三是以优厚待遇招聘外地人才。他们已经招聘了外地的1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对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才为之提供一栋具有全套现代设备的“别墅楼”。大邱庄经济的腾飞，人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五、由平均主义和少劳多得的旧观念转变为按劳分配、多做贡献的观念。由于过去长期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大邱庄农民一方面存在着把按劳分配与平均主义“大锅饭”等同起来的观念，把人们对社会贡献大小不同而造成的分配上的差别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平均主义“大锅饭”又掩盖和助长了一些人“少出力、多拿钱”的自私自利观念。特别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干的不如唱的分配多，多干的不如少干的吃得开。由于分配不合理，结果养了奸滑人，肥了懒惰人，埋没了各种能人，打击了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高的人。通过拨乱反正，大邱庄党委在改革中把铲除平均主义观念，打破“大锅饭”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抓。通过四次改革，在分配上实现“统一经营，专业承包，联产到劳，累进计奖”的方法，把每个人的收入与劳动成果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做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印刷厂的业务员马继明1983年承揽了400万元的活儿，按照规定，发给他工资和奖金8000元。1983年务农收入最高的达1.6万元，最低的是500多元，二者相差30多倍。到目前，在过去的8年中务农人口数量每年递减30%以上，农业产量每年递增7%，生产效率比改革前的1978年提高了63倍。现在大邱庄人都明确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领导敢于把钱花在“尖”上，即敢于用重金鼓励冒尖的人们，劳动者则不再顾虑依靠辛勤劳动致富后会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从而更加理直气壮地贯彻和维护按劳分配原则，人人争先创优、多做贡献已蔚然成风。同时，他们富裕之后还做到“四个不忘”：一是富了不忘国家，努力向国家缴纳税金。1986年向国家缴纳税金740万元，平均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户向国家贡献1.14万元。二是富了不忘集体，扩大集体积累，增加集体福利。1986年全村公共积累达到5469万元。三是富了不忘扶贫。目前，大邱庄的企业已为外地安排了2809个劳动力，培训了一些技术骨干；向全县提供扶贫专用资金4万元；为一些经济学报刊提供资金4万元，用于给全国贫困地区订报纸，以传播致富经验和经济信息。四是富了不忘改革。在巩固改革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把改革引向深入。

大邱庄农民的观念更新，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而是公司支部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采用“思想教育晓之以理，严格规章导之以轨，物质鼓励施之以利”的综合治理的结果。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经济上富了不等于精神上也富了。旧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发生尖锐的冲突。不进行观念更新，不提高人的素质，改革就不能深入进行，商品经济就不能继续发展。于是他们于1984年提出了“破除小农意识，实现观念更新”的口号，反复宣传教育，使新的生产、流通、分配、人才、竞争、信息、贫富、道德、消费、生活、理想等观念“入耳入脑”，并制定了一系列厂规厂章和村规民约，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之潜移默化化为人的心理素质，进入意识结构；并用经济手段对好的进行鼓励，对差的进行教育，使经济利益成为人们观念变革的强大动力。因此，大邱庄人的观念更新既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党支部积极宣传教育的结果，反过来又对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

作者工作单位：国防大学

责任编辑：王 颖